**中国与世界——改革开放40周年**

**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于拉丁美洲**

*Maria Francesca Staiano[[1]](#footnote-1)\**

**介绍**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78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进行全新的变革，此政策不仅注重国内体制改革，也把目光集中在了“走出国门”。

“改革”与“开发”两个元素至今都在持续不断的发挥着它们的影响力，其特有的中国元素在全球独树一帜，“邓小平模式”也深远的影响了继任的中国总理们。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第十二届党代会发表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持续性，就像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2018年3月被写入党章。中国特色是影响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新战略，影响方面包含经济，法制和政治等。同时，它也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核心内容，它发展对于南半球国家也尤其重要。

如今，中国和拉丁美洲代表了改变世界秩序的伟大梦想，两个地区的人民一直奋力抵抗西方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然而，由于殖民历史及欧美国家的经济干预，中国和拉美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上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论与其刻板的模式无法同中国和拉美的国情相结合。而中国乃至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提高与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东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力研究及宣传其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先秦时期儒家、道家思想等等，然而这一切都要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

1.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和本土理论，秦亚青理论。**

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主要流派，它们分别来自三个中国政治理论先锋人物：秦亚青，阎学通以及赵汀阳教授。

秦亚青教授在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理论未成形阶段（1978-1990），理论学习阶段（1991-2000）以及理论创新阶段（2001-2007）（秦，2009）。1979年，在多种思想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辩论：（1）中国是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还是民族国家；（2）什么是中国的首要国家利益以及依靠什么实现国家利益；（3）中国和平发展及和平崛起之可能性（秦：2011:231）。

1878年至1979年“三个阶段理论”及三个辩论的提出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邓小平倡议走出国门，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此举于现代中国是至关重要、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在那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队伍（秦，2011:235），依据国情及主要问题，开始大力引进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指导。其次，中国加强研究和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也表现了其想融入国际家庭的强烈愿望，这让中国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朝着经济政治现代化国家前进。中国渐渐变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初出茅庐的民族国家（秦，2011:239）。

在1991年至2000年之间，理论逐渐成型。而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理论实行十年有余，关于国际关系的学术辩论也把重点放在了怎样最好的定义、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秦，2011:240）。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90年代末引进的现实主义理论著作之外，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著作也在中国传播开来。两种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的碰撞交叉促使了人们关于国家主要利益的辩论。一方面，中国的现实主义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利益是政治及军事安全，因此要加强国家物质力量，不能依赖国际社会（秦，2011:241）。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论者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互信互利的多边主义合作机制（秦，2011:242-243）。

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从国外引进的自由主义及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主流理论，对学术界和政治界均非常重要。如今看来，当时的现实主义理论促使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型，而自由主义理论帮助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发光发热（秦，2011:244）。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建构主义理论开始得到宣传；2000年初，此理论得到广泛重视。

2000年至今，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辩论均围绕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在理论创新阶段的的最后时期，共有三种西方思想独占鳌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秦，2008）；同时中国也在加强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设理论（秦，2009:195-198）。“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及“和平发展”等中国概念均在这几年中产生。

如今，在“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的辩论中，现实主义论者与自由主义论者分别持反对和支持的观点，后者也在努力通过合作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而建构主义论者也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预见了中国在国际组织机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秦，2011:247）。南美洲国家同样致力于合作发展，目前的区域合作组织有南方共同市场，南美国家联盟及太平洋联盟；论坛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金融及信用机构有安第斯开发公司以及泛美开发银行。

秦亚青教授的理论提倡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与东方理论相结合。虽然西方理论被当作宝贵的经验，但其在运用过程当中于中国国情产生了许多矛盾（秦，2011:249；秦，2009:192-194）。秦亚青强调，关系性理论作为中国理论中新的本体论基础，以理性主义和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概念构成。秦教授也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严重的缺点便是其中缺乏对关系的理解（秦，2011:250）。

秦亚青强调，关系是确保稳定和秩序的唯一良药。这也和孔子“道德”、“互信”的思想一致（秦，2011:133）。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仁”这一概念的一部分。

秦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也可以通过“人际关系”这一概念来进一步阐释。此概念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同时也可作为国际关系的指导概念。以此方法，人际或各个组织之间以互信为基础的关系可以打破民族国家带来的限制，从而形成新的国际纽带。这也使我们思考，国际社会中的主题和参与者不断更迭，促使了不同于传统外交模式的新型关系的兴起。

在地缘政治学中，根据路易·索雷尔的描述，如今是“网络关系时代”，在过去十年中，对于权力的定义及使用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传统分析家会将领土（大小，位置及资源）、人口、以及军事力量放在首位；而现在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往往要同经济、金融、知识、意识形态及文化辐射、集体行动能力等因素一起发挥作用，后者的影响力在一些情况下也开始超过前者。“国家的排名是综合以上所有因素而得出的，这就衍生出了新的权力模式。”（索雷尔，1999）。例如，地方组织，中国移民网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帮助理解及建立新的国际关系。

由此看来，“关系”这一概念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关系网络就是一群拥有相同的、非正式的准则及价值观，远远超出了市场交易中所必要的条件。”（福山，1999）那么根据这一概念，“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基于信用的道德纽带，“关系网络”及“忠诚”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概念之二，是社会中最重要的“通行证”。

**2. 阎学通的“中国特色现实主义”。**

阎学通教授提出了“清华路径”，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普世性，中国特色并不构成独立的一支，它可以融入到国际理论当中，以完善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如今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均是由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语言为主导，所以阎教授倡议要在其中加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语言（阎，2011:8）。

阎教授在进行当代关系研究时，考虑到了两个历史时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以及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阎学通指出这两时期的中国历史与198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有相似之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分裂，周朝霸权，政权混乱，社会动荡（阎，2011:3）。此时期也催生了“天下”这一概念，意思是“所有人和物都生活在同一片天之下”。由此观之，阎教授的普世理论与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和谐的整体关系紧密相连。

在春秋和战国时期，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辅佐当时的君王。他们不仅仅讲授抽象的理论、哲学、历史或是政治道理，而是实事求是的解决政治和社会冲突，化解复杂的外交难题（We, 2011: 18-58）。在先秦时期大放异彩的思想家至少有七位：管仲，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及韩非子。除了法家学派的管仲和韩非子以外，其他几位都提倡道德与国家秩序的统一：他们认为“人治”的道德标准就是国家的道德标准（阎，2011:5），这就是为什么任用道德高尚的人如此重要的原因。

阎学通特别强调荀子思想中的“人治”。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等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国内的平衡，它们可以有三种统治方式：人治，军权，和暴政。暴政存在于军事压迫的基础之上，因此也会为国家树立许多敌人，招来许多战争。军权统治比暴政要更加道德，但是它也是基于霸权。人治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标准：用统治者高尚的道德来使臣民信服。统治者积极在国内建立规范，改善与其他国的来往关系。但是，人治的概念也需要政治力量和物质力量来辅佐，因为它往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和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Creutzfeldt, 2012: 2）。

“人治”这一概念由两个字组成：“人”和“治”。“治”代表了强大的物质与政治力量。“人”一字说明国家需要盟友来稳固统治（Creutzfeldt, 2012: 2）。阎教授将荀子“人性本恶”的现实主义思想同孟子的“人性本善”思想融合到了一起。

阎学通称，目前中国应该把重心从经济建设放到创建和谐社会上来，通过多肩负国际责任，在国际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保持与盟友的紧密关系，这些思想根深于中国古代哲学（Creutzfeldt: 6）。阎学通认为，国际地位较量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政治力量，而政治力量的关键便是仁德的管理国家（阎，12）。

**3. 全球国际关系议题：赵汀阳的哲学思想**

赵汀阳教授并不是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他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政治哲学，但他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的思想也值得一提。赵汀阳将世界看作“天下”，这是他研究分析的基础。阎学通也把这个概念作为自己研究的一部分，而秦亚青也将其作为一个理论假说。

赵汀阳理论在开始便把如今的世界形容为“非世界”，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哲学，世界陷入了霍布斯思想式的混乱（赵，2009:5）。人们忽略了“全球性”的真正含义，将其与“国际性”混为一谈。“国际性”代表了每个民族国家为追求自己的私欲从而冲突不断；而“全球性”和“天下”这一中国概念深有共鸣（赵，2009:5）。如今，人们对于“全球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移民和战争等议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这也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所以赵教授将希望放在“天下”这一概念，其可以打破民族国家制定的古板框架，为全球政治注入新的道德价值观。

赵汀阳致力于让“天下”这个传统观念概念化，现代化（Kumar, 2015: 6）。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国内的统治思想便是基于“天下”这个概念。“中国”意为在世界中心的文明国家，而天子是被神授以君权，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税收系统是对外联系的渠道，此系统要靠等级制度的维持以及人民的教化程度；此外也需有一个对抗蛮夷之族的国防战略（Noesselt, 2012: 18）。因此，这三个元素构成了一个圆形统治系统：统治者在中心，被他的子民、税收系统以及蛮夷之族所环绕（Hoon Jon, 2016: 72）。赵汀阳将“天下”这个概念一分为三：普天之下所有的土地，人民，以及管制全球秩序的政治机构（赵，2006:30）。这三个元素完美的代表了地球，人类和政治机构（赵，2009:9）。此概念可以解释中国近几十年为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比如中国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作为。

在赵汀阳的理论中，“关系”也是“天下”概念中重要的一环（赵，2009:10）。“天下”、国家和家庭都需要有等级森严的关系制度，这也在孔子学说中被反复提及（赵，2009:11），其次序由下到上为：家庭，国家，天下，由此保持稳定。“天下”这一概念与地球村相同，两者都强调和谐共存的关系（赵，2006:33）。

**4. 2016中国对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政策新文件中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2008年，中国发布了第一份针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政策文件，此文件为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分别于巴西（2012年），秘鲁（2013年），阿根廷（2014年）及委内瑞拉（2014年）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政策涉及方面涵盖政治，文化，经济，技术及军事等。2016年11月中国发布了第二份文件，总结过去八年合作经验，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合作抬上了新高度。

2016年的文件中，有许多关键因素与三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相呼应，同时文件也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距此原则第一次提出已60载有余。

文件序言中重点提倡全球化和多极化，努力达到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的目标。文中提及了赵汀阳教授“天下”的概念，提倡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也被描绘成“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文件旨在“将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合作抬上新高度，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中指出，“通过两地区人民的交流合作，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不仅建立了紧密的友谊，也为世界文明和谐共存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下”这一概念，超越国界，开放包容，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达到世界文明和谐共存的局面。此外，中国也肩负起了做发展中国家“兄弟”的责任，为各个没有更多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指导。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探讨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关系政策的特色。

回顾历史，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制度开始之初便积极建立合作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开始帮助朝鲜、越南等国家进行重建工作，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Surasky, 2014）。

中国在1964年颁布的“关于第三世界经济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文件，在今天依然有效，其内容有：

* 中国政府始终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绝不把这种帮助当作单方救济，而是相互帮助。
* 在援助其他国家时，中国政府严格尊重受援国家主权，从不强加任何条件或特权。
* 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必要时延长支付期限，以尽可能减轻受援国的负担。
* 中国政府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目的不是让受援国依赖中国，而是帮助他们逐步迈向自给自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之路。
* 中国政府会尽己所能帮助受援国完成投资低、见效快的项目，增加收入，积累资本。
* 中国政府以国际市场价格提供中国制造的最高质量的设备和材料。如果中国政府提供的设备和材料不符合议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同意更换或报销。
* 通过提供任何技术援助，中国政府将确保接收国的人员完全掌握转移的技术。
* 中国政府派出的支援专家会以相同标准在接收国进行建筑。

然而，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基于“帮助国家发展”的理念，一些评论家也对中国在南美国家开展的一些项目表示担忧，因为这些项目都属于能源和自然资源（石油以及其他矿产）领域，它们对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这样看来，中国和南美国家的合作与传统上的国际合作（南北）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中国现在对南美国家实行的不偿还贷款还在初级阶段，而且受惠国只有两国：海地和古巴。

另一方面，拉美国家一直是“和平区域”，这也表明此地区双边和多边的友谊合作关系可以更进一步。因此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展了不同的合作模式，如南美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以及最近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部长级论坛（于2014年在哈瓦那宣布成立）。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第一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部长级会议召开，其目标为：深化双方合作关系，在贸易，金融，能源，科技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双方对话交流，保障稳固的政治进程。这是“天下”理论的又一次阐释，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特色。

**5. 总结**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兴的中国特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持续发展且愈发深入人心。这些理论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为核心，继承了先秦时期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及老子的智慧。赵汀阳的“天下”、阎学通的“人治”及秦亚青的“关系性”等概念，汇集了历史长河当中的智慧。在过去，关系的建立依靠高尚的品德，而不是争夺领土或贸易往来（赵，2006:33）。中国对于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赵，2006:34），人们的学识和合作让家庭和国家都关系融洽。

“中国特色”同样包含这些古老的思想，它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在经济领域，习主席提出了“新常态”政策，中国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前进；在法制领域，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许多人也打着无法利用数据分析学习的旗号批评这些新政策缺乏透明度。但这些概念确实为我们打开了新理论的大门。这些创新深植于中国古代传统，又为世人提供了另一条值得学习和探讨的道路。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应重视中国理论，因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倾向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论的，而南半球国家需要一个平等、公正的新秩序。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理论（工业化，权力及军事化）已经不适用于全球的需要了，因为人们有了更多的因素需要考量，比如环境，平等，教育及健康等等。

我们如今可以看到伟人邓小平提出政策果实累累，人们也将继续保持勇于改革的劲头。

译者：康郁

1. [↑](#footnote-ref-1)